

传承与创新: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检阅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2023学术年会综述

陈志国 拜嘉豪 赵越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2-0141-05

2023年11月24日—26日,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主办,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岭南农耕文明重点实验室和广州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共同承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2023学术年会”在华南农业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大学、山西大学、西北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潍坊科技学院等全国40余家单位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盛会。在新时期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本次会议主题聚焦农耕文明与乡村全面振兴,与会学者主要围绕“古农书整理与创新研究”“动植物史与古代农业研究”“近代农业发展与转型研究”和“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建设研究”四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交流。兹将会议交流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古农书整理与创新研究

古农书作为农业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了我国丰富的传统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农业遗产和文化财富。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作为农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素来受到广大农史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一)古农书整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与会学者围绕新时期古农书整理与研究的出路与方向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曹幸穗(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古籍研究的跨界创新思维》提出要突破古农书本身,从农书与时代的交互影响、农书与“非农书”的作者与读者、农业古籍与科技古籍的叙事范式、汉字和汉语中的农业溯源等四个角度开辟跨界研究的新天地。曾雄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其命维新——古农书整理的传统与现代》指出近三十余年来的古农书搜集、整理和研究经历了由传统“手工劳动”到现代“人工智能”的转变,古农书研究呈现了诸如“E考据”、数字人文、智能化利用等新的研究趋向。惠富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新时代中国古农书研究回顾与展望》从“古农书校注与今译的新成果”“古农书影印与丛书出版成果的涌现”“农书研究继续推进”“中国古农书整理与研究的展望”四方面对新时代古农书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展望。倪根金(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古籍点校注释整理体会》以整理朱橚《救荒本草》为例,提出农业古籍要从“知识之储备”“工具之收集”“底本之选取”“整理之方式”“注释之选择”和“辞书之利用”六方面进行点校、注释和整理。卢勇(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的前沿与瞻望》重点探讨了国家需求视野下的农业史发展前

[收稿日期] 2023-12-29

[作者简介] 陈志国(1979—),男,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史、农业史及传统乡村社会等;拜嘉豪(2001—),男,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赵越(2001—),男,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瞻、农业史与大数据时代下的计算史学和农业史与新文科背景下的学科交叉问题,指出未来农史研究要立足中国实际,面向解决重大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新视角下古农书的个案研究

除了从宏观视角总结和展望未来古农书研究外,也有不少学者关注古农书个案研究。王少迟(全国农业展览馆)《雅与俗:清代农书〈看蚕词〉考论》从作者经历、时代发展及农学思想等方面分析了《看蚕词》的价值,阐述了其所蕴藏的珍贵农学思想。牛晓宁(华南农业大学)的《基于〈农桑易知录〉的稻作品种及种植考察》重点分析了《农桑易知录》中记载的稻作品种起源、性状及品种特色,稻作种植方法。刘凯先(中山大学)《〈陶朱公养鱼经〉与早期渔业养殖探研》探讨了《陶朱公养鱼经》为何假托陶朱公之名的问题,并将“陶朱公养鱼”传说的形成与渔业养殖溯源相联系,提出两周时期具备形成人工养鱼条件的地区大致分布在齐莱、江淮、巴蜀和河西地区。秦闯(南京农业大学)《试析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中的农业资料》则对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所记载《三十时》的文字考释、节气体系、阴阳五行观及历法进行考察,提炼了其中的时间结构、农史内容,弥补先秦两汉农史资料不足。张雅宁(安徽财经大学)《技术、经济与意识形态:作为劝农文的〈补农书〉》从《补农书》写作目的展开分析,从技术、经济和意识形态角度,解释了《补农书》作为劝农文的作用。

二、动植物史与古代农业科技研究

古代农业是中国农业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一直以来也是农史学者研究关注的重点。学者们围绕动植物史与古代农业科技等内容进行了互动交流。

(一)动植物史研究

动植物史研究成为近年来农业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历史时期动植物的变迁。王思昊(华南农业大学)《明清广府地区鲥鱼资源研究》分析了明清广府地区鲥鱼名称和认知、分布情况及集中分布原因,总结了捕捞鲥鱼的渔法渔具和多种利用方式。黎良基(昭通学院)《宋代驯猫史:宠物饲养与商品经济的交融》从宋代驯猫史切入,以家猫饲养与宋代社会经济为视角,系统探讨了宋代家猫宠物化问题。陈琳、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历史时期马蔺的名实考辨与利用研究》通过类比相似植物名称及音译方式,对其名称进行甄别,分析了马蔺在药用、日用、救荒方面的利用价值。费雨辰(华南农业大学)《明代大豆的品种、栽培技术及功能》认为明代大豆在食用方面退出了粮食作物行列,成为副食食料,其作为肥料的需求扩大,作为饲料作物的功能延续前代。陈沐(山东中医药大学)《明清时期绿豆功能变迁研究》归纳了绿豆在历史上的各种功能,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对明清绿豆功能变迁进行了分析,得出由绿肥到食用再到药用方向的转变。杨品优(华南农业大学)《荞麦与花麻》分析了不同语境中花麻、荞麦、三角麦、花麦的名与实,对比粤湘赣不同地区的称呼差异,探讨“荞麦”不同指称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意义。戴方晨(《农业考古》杂志)《古代中原竹文化探讨》总结了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竹林分布、竹林资源利用方式,探讨了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原竹文化,揭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原地区古老的生态文明机制。屈桂波(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古代桃胶文献研究》分析了桃胶的分布,考证了其名称,并从药用、文学艺术、佛像、书法四方面对中国古代桃胶应用进行分析。彭德(华南农业大学)《南药巴戟天的认识利用及其分布变迁研究》梳理了历史时期人们对巴戟天的认识利用演变过程,并重点对清代巴戟天传入岭南地区及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域外作物的本土化研究近年来也颇受学界重视。朱宏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其报告《和而不同:域外引进作物的本土化》从风土适应与调整、技术改造、社会容纳和文化接纳等环节对域外引进作物的本土化过程作了梳理。陈明(西北大学)《中国引种花生时间考》通过对花生的起源与驯化以及花生的全

球传播的考据,认为美洲花生大约在崇祯年间从东南亚经海路传入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张箭(四川大学)《美洲药材作物古柯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影响研究》探讨了古柯的引种及开发利用,还原了古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过程,并引申至古柯树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发展。孙静静(四川大学)《蔓越莓的起源、发展与全球传播》通过对印第安人原始蔓越莓文化的研究、欧人对蔓越莓的发现与使用以及种植、采摘和贮藏技术的进步,对蔓越莓在全球的传播与发展做了总结。

(二)古代农业科技研究

古代农业科技史作为农史研究的传统内容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主要关注先秦农业科技史、水利史和蝗灾史的研究。曹传松(湖南省澧县博物馆)《长江中游史前城演进与水文化发展》通过对湘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考察,对舜禹时期水资源开发与利用、调控和管理体系进行了探索与研究。曹传松等《论长江中游荆江河道的三次变迁》根据《禹贡》等古文献记载、前人研究考古实地考察,提出荆江曾经先后向三角洲两岸变迁,荆江三迁符合地貌演变规律和地理逻辑。曹传松、向安强等人《论长江中游史前三座鸡鸣城》以考古学的方法对鸡鸣城及养鸡部落从地理环境、鸡鸣城进行剖析,探讨了家鸡起源及其养殖形态迭进。王宇(广东创新科技职业技术学校)《先秦砾石丹书中的涉农资料初探》以近年考古发现的以红色矿物质颜料书写在卵石上的精神图符和早期“文字”为资料,将这些符号与甲骨文进行对比,总结和归纳了其中的涉农资料。

段彦(南京农业大学)《明清时期洞庭湖地区堤垸问题研究》从经济与技术角度对明清洞庭湖堤垸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堤垸问题的本质即是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停滞。赵九州(青岛大学)《从“求诸野”到“求诸田”:古代华北传统燃料的变革》分析了华北地区天然燃料和人工燃料的比重变动,认为燃料需求经历了从自然供给到人工栽培的转变,而这一转变背后则是生产作物结构、役畜饲养结构、秸秆燃料化与华北土壤肥力产生的影响。郭云奇(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物候、水汛与河防:黄河十二月水名及其防汛意义》通过考究不同时期的古农书,分析了黄河十二月水名体系的形成、水名中的物候渊源与水文反应,探讨了水名、水汛对当时水防的积极作用。罗粤莉(华南农业大学)《清代治蝗“护田夫”法考论》考察了清代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指出政府为应对蝗虫灾害设立了护田夫制度。陶江锐(华南农业大学)《“蝗飞入海”历史流变与宋代攘蝗思想转型》梳理了“马援文本”书写范式从“蝗不入境”到“蝗飞入海”的历史流变,并将其与“刘猛将军”的传说体系进行对照。

三、近代农业发展及转型研究

晚清民国是中国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重大变动和转型的时代,西学东渐、中体西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农学知识的传播和利用也受到此种思潮影响,新的研究理念、方法促成了近代科学知识的本土化。当今农史研究也在转型的道路上迈进,农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构建等研究成果开拓了农史研究的新领域。

(一)近代农业知识本土化研究

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后,向西方学习的风潮开始盛行。许多国内学者积极普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以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开启了近代知识的本土化进程。陈志国(华南农业大学)《西方科学知识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广东土壤调查的兴起》认为20世纪30年代广东土壤调查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西学本土化与知识积累的过程,西方土壤学知识的传入、我国土壤学家的培养、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都推动了近代广东土壤调查的兴起。黄小莉(华南农业大学)《民国时期广西土壤调查报告研究》认为在国外土壤学知识的传入和外国专家指导下,广西拥有了相关知识储备和机构院所,为广西土壤调查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危志锴(华南农业大学)《晚清〈江西农报〉所见农业调查述略》

通过对《江西农报》中所载的农业调查报告的分析,认为《江西农报》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认同和运用,是近代江西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缩影。易嘉良(华南农业大学)《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沙群岛土壤调查述略》阐述了我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沙群岛的四次土壤调查,认为该调查为我国南海主权的法理性提供现实依据。近代国外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方法的革新,还体现在相关出版物的理念转型。刘玲娣(华南农业大学)《近代农业科技期刊〈农学报〉的出版史考察》详细地阐明了《农学报》的创刊情况,分析了《农学报》的办报宗旨和栏目设置的变化,并探析了《农学报》与近代农学之间的关系,通过文献分析出《农学报》在当时已颇具影响力。李阳(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经验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的融合体——高鲁甫〈荔枝与龙眼〉评介》从分析《荔枝与龙眼》作者高鲁甫背景入手,引出《荔枝与龙眼》全书内容与成书原因,并分析了《荔枝与龙眼》的文献价值,认为其见证了中国农学发展的转变过程,提供了有影响力的农学材料。

(二)近现代农业转型研究

随着国外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和吸收,近代有识之士开始运用西方科技解决农业转型的困境。王佳妮(中山大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作法改良困境与因应之策》指出了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时期所遇到的农业发展困境,并阐述了共产党利用传统的精耕细作理念增加农业产出,努力摆脱困境的过程。随着国外科学技术的运用不断深化,我国农业经济和水利建设也取得了一定发展。冯健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第一期经济建设农业计划的制定、调查与执行》梳理了“台湾经济建设四年计划”中农业计划的制定、调查与执行的历史,并表示该四年计划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提升到同一高度。聂浩然(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浅析近代台湾地区的水利建设(1895—1945)》则阐述了日据时期台湾建造农田水利工程、防洪工程、水利发电工程等水利设施,尽管这些工程是为满足日方盘剥台湾资源而建造,但客观上促进台湾农业发展的现实也不能忽视。吴云峰(黄山学院)《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经济》展现了合作社经济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发挥巨大作用的历史过程,认为该合作社经济起到了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产价格、打破经济封锁的作用。杨瀚(华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视野下的民国蛋品出口贸易研究》认为交通运输和加工储藏技术对民国时期蛋品出口有很大影响,技术水平不足导致蛋品出口受挫。钱珠栎(西南大学)《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群众武装组织改造的历史考察(1924—1937)》则梳理了抗战前党的武装组织发展的历史,认为这一时期党对农民群众武装组织的改造是不断细致化、规范化的过程。

四、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建设研究

自200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以来,农业文化遗产开始逐渐受到人们关注,也成为农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与会学者主要围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农耕文化赋能产业振兴、乡村文化建设等内容展开交流。

(一)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隋斌(全国农业展览馆)《传承发展农耕文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关于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指出新时代中国农史研究背负着文化强国的使命,中华农耕文明思想智慧对建设农业强国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幅员辽阔的中国拥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各个地区的农业文化遗产特点鲜明。尚家乐《长三角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渊源与前瞻》梳理了长三角河口海岸带的沙田、涂田和圩田的开发历史,指出长三角河口海岸带农业文化遗产既有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科研价值,也面临区域独特的濒危性、农业景观格局的脆弱性和传统农耕技艺的保护传承困境。刘家振等(华南农业大学)《试述广东南雄水旱轮作系统的特点与价值》分析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南雄水旱轮作系统特点和价值,认为该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形式多样的水旱复种轮作制、极具个性的盆

地农业模式、品类众多的生态农产品和丰富多彩的农耕民俗文化四大特点。张莹(中国农业博物馆)《藏猪传统养殖系统及其农业文化遗产特征》分析了藏猪养殖历史和传统养殖方式,探讨了其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为藏猪传统养殖系统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梁晶璇、路璐(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记忆对品牌价值的影响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实证研究》以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作为研究案例,通过互联网检索和软件编码,构建了农业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内化效果和外显效果模型。王梦琪(中国人民大学)《从“农业遗产”到“农业文化遗产”:我国农史研究的话语转向》梳理了我国农史研究从“农业遗产”到“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过程,话语的转向表明从文本的变化到社会的实践,农史研究的新方向得以巩固。赵飞(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对广东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了全面梳理,不仅肯定了其发掘与保护工作的重要成果,而且指出了其面临的问题与困境,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对策。

(二)农耕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研究

中华农耕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如何将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点议题之一。王璿、叶倩钰(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东莞厚街莞草编织研究》从莞草制作的历史入手,结合莞草发展现状,以乡村振兴视角指出了莞草的应用价值,提出其传承和发展策略,并认为莞草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刘安壕(南京农业大学)《丰顺木薯种植历史、现状与产业振兴对策》梳理了广东丰顺县晚清以来木薯的种植历史,其中重点介绍了抗战时期当地推行激励措施促进木薯种植产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并通过分析目前丰顺县木薯种植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木薯产业振兴对策。樊道智(山西大学)《左江流域壮族蓝靛染色历史与工艺传承研究》通过考察广西崇左市金龙镇、寨安乡等地的壮族民间木蓝蓝靛染色历史及其制取工艺,发现其与《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相应记载几无差别,并指出左江壮族木蓝染料制取与染色技艺是探究左江流域壮族染织技术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活化石。徐晶、朱世桂、刘馨秋(南京农业大学)《唐宋末茶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新思考》指出末茶即现在的抹茶,并通过文献考证了唐宋时期末茶的加工及品饮方式,探析了唐宋末茶的价值内涵,最后表明唐宋末茶对于当代末茶制作工艺、吃茶养生和中国茶文化都有价值启示的作用。

(三)乡村文化建设研究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围绕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了交流。乔柏(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农耕文明与当代乡村振兴——以古村落罗村传统文化优质资源保护与建设为例》指出要依靠文化中的优质资源参与乡村振兴,提出了古村落文化优质资源与振兴乡村项目对接、激活优质资源形成新项目、新项目效益丰富古村落文化的发展路径,并通过罗村体现具体实施措施发展古村落的现实案例。葛欣旭(中国农业博物馆)《乡村振兴视域下耕读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研究——以山西省高平市苏庄村为例》阐述了耕读文化的起源发展、文化内涵与深远影响,并以山西省高平市苏庄村为例体现耕读文化的保存现状与发展困境,最后提出了耕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路径,即从传统中创新、保护与发展经济并举、耕读纳入社区教育三条方案。阙砚(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高校美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创新路径研究》阐述了高校美育工作对于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通过提升村民文化素养、提供乡村文化服务、传承发扬乡村非遗来实现高校美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三点创新路径。

综上所述,此次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农业历史2023年学术年会,是一次农史研究传承与创新的全国性学术盛会。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农耕文明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既体现了集中全国农史学界的集体智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也是新时代我国农史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

(责任编辑:徐定懿)